



《打刺赤碑记》考释

张玉海 张琰玲

摘要: 本文结合《宋史》、《宋会要辑稿》、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等相关史料对《嘉靖万历固原州志》所录《打刺赤碑记》进行了考释,指出《打刺赤碑记》真实反映了 1098 年至 1102 年宋与西夏、青唐之间在熙河地区的复杂关系及其宋沿边政策的变化与边防形势,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宋、夏、青唐之间的复杂多变的关系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。

关键词: 打刺赤碑记; 宋; 西夏; 边防; 史料

《打刺赤碑记》又名《建怀戎堡碑记》,宋人张安泰书,所记内容涉及宋夏关系、宋边防军制及当时地理环境、西夏的西寿监军司位置等诸多信息。原碑已湮没失考,唯明《嘉靖万历固原州志》^①、清康熙年间《重修靖远卫志》^②和清光绪三十四年手抄本《打拉池县志》有录。今学者多利用《嘉靖固原州志》卷 2 所辑录碑文来考证西夏西寿监军司位置^③,但对其他记载利用不多。而《嘉靖固原州志》、《重修靖远卫志》两志所录碑文略有差异,似也未引起学者注意。故笔者不揣简陋,结合相关文献,略做考释如下。

为方便起见,先将《嘉靖固原州志》卷 2 所载《打刺赤碑记》全文转录如下:

崇宁元年壬午岁,承朝旨筑打绳川。熙河帅姚雄驻兵会州,应副钱粮运使吴安宪,统制官熙河郭祖德、刘戒,泾原乔松,秦凤刘德,西筑水泉、正川二堡,通古会州。三月初,皆毕功。行打绳川,赐名怀戎堡,隶会州熙河第八将。后三年乙酉岁正月,割隶泾原改第十五将,将官张普,统领人马东筑通怀堡,接泾原定戎,开护道壕。当年八月,却隶熙河,复第八将。

怀戎东南曰屈吴山、大神山,小神山,皆林木森茂,峰峦耸秀,山间泉流数派,以法泉禅寺为额,给田五十顷,岁赐拨放柴衣。西南白草原,通会州。北有宝积山,产石碳、甘铁。东北去西寿监军一百五十里。西北去马练城八十里。堡之西南百余步,有泉眼涌出,泓澄甘冽,止而为湖,不徒有赏玩之景,民田灌溉实赖其利。

大观三年己丑春,废寨,主将兼领之。安泰自是年中冬到官,布耳目,备战守。庚寅春,创瞻军园,补烽台,完城堞,更寨宇

为怀戎堂,以延使节。置衙校场,建利威堂,阅武习射。秋润八月,与夏人分画界。辛卯春展,将听便于管犒。孟夏创宝积堂,因山名之。仲夏,就堂之北葺书室,曰镇静斋,盖新制,择将深沉镇静、果敢有勇者,为将副,就而名焉。

创堡将已十年,殊无铭记。虑其岁久莫知始末,安泰昔任运司日,尝董筑事,今复官此,直

① 《嘉靖万历固原州志》,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3 年。

② 石一焯、李一鹏等《重修靖远卫志》,台北:台湾学生书局 1968 年。

③ 鲁人勇、吴忠礼、徐庄《宁夏历史地理考》,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3 年,第 155 页。

叙其详。使后来者有所考。政和元年辛卯岁六月壬辰八日己亥，巡检柳世雄、冯进、监押杜谓、唐昱，部队将假遇、赵普、崔恩，供备库副使第八将兼堡事武骑尉张安泰书。

《嘉靖固原州志》为明代杨经纂修、三边总制王琼裁正、陕西三边总制唐龙撰写序言并刊印，是现存固原地区最早的古代方志。该书卷2收《打刺赤碑记》，其后有杨勉所撰《重建靖虏卫打刺赤城记》称“打刺赤古城，按旧志不载兴废之由，或者以为宋御夏人之患所筑欤！是城东距西安州八十里，西去靖虏卫八十里，北临鲁寇冲突之地，南控居民耕牧之场。”其时城已废毁，其兴废之缘由已不甚清楚。清康熙年间所修《重修靖远卫志》则定名为《建怀戎堡碑记》，下注“即打刺赤”。按，打刺赤，即今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境内屈吴山正北山脚下打拉池。宋代先后有啰逋川、打啰城川、打绳川等名称。宋景祐三年（1036年）元昊在啰逋川筑打啰城。《宋史·神宗本纪第十六》载，元丰四年（1081年），宋五路大军攻夏，李宪统军出熙河，九月败夏人于屈吴山，十一月败夏人于啰逋川。^①而《宋史·李宪传》中则记“元丰中，五路出师讨夏国，宪领熙、秦军至西市新城。复兰州，城之，请建为帅府。帝又诏宪领兵直趣兴、灵，董毡亦称欲往，宜乘机协助，入扫巢穴，若兴、灵道阻，即过河取凉州。乃总兵东上，平夏人于高川石峡。进至屈吴山，营打啰城，趋天都，烧南牟府库，次葫芦河还。”^②结合两处记载，知宋军当时即曾到啰逋川，筑打啰城。《潮音观碑记》载“贞观大治，置打绳州府，啰逋川易名打绳川”^③，“一说当地产芨芨草，可结绳索，故名打绳川”^④。前引碑文有“崇宁元年壬午岁，承朝旨筑打绳川。熙河帅姚雄驻兵会州，应钱粮运使吴安，宪统制官熙河郭祖德、刘戒，泾原乔松，秦凤刘德，西筑水泉、正川二堡通古会州。三月初，皆毕功。行打绳川，赐名怀戎堡，隶会州熙河第八将。”另《宋史·地理志三》“会州”条：“怀戎堡，崇宁二年筑，属秦凤路。”则知，宋代此地在立碑之时，先后有打啰城、啰逋川、打绳川、怀戎堡之称，又以怀戎堡为其最后正式名称。因此，原碑名当依《重修靖远卫志》所载，为《建怀戎堡碑记》。那么，“打刺赤”之称又从何而来呢？有说在蒙语里“达喇赤”意为牧场。1227年，成吉思汗灭西夏，怀戎堡为蒙古所占。此地为蒙人牧场，称为“达喇赤”。至迟在明嘉靖时即已音讹为“打刺赤”。^⑤则“打刺赤”为元明时的称呼，宋代还无此说。

碑文首句“崇宁元年壬午岁，承朝旨筑打绳川。”标明宋人眼中的筑城之始与原因。崇宁元年壬午岁即公元1102年。崇宁为宋徽宗在位时的第二个年号，取继承神宗，常法熙宁之意。宋哲宗初期，高太后主持朝政，重用司马光等人，对西夏采用“弃地弭兵”的消极防御政策。宋夏之间暂时相对和平。元祐八年九月，哲宗亲政，改元绍圣，“有复熙宁、元丰之意”。宋对西夏开始逐渐强硬，罢诸边划界，渐绝岁赐。与此同时，哲宗采纳章惇等人“择地筑垒”，“据形胜以逼夏”的建议，在宋夏沿边积极修筑堡寨，开边西北。经平夏城等一系列战役，至徽宗时，已经是“闻朝廷熙、秦、延、庆、泾原、河东六路进筑，五七年间，建置城若砦垒数十。”^⑥“朝廷自近岁以来经营边事，无不如意”^⑦。据吕卓民先生《宋夏陕北争战与北宋筑城》统计，宋新筑堡寨80余，且绝大多数越宋夏分界而深入西夏境内^⑧。但徽宗即位之初，皇太后权知朝政，拓边活动暂时告寂，两国处于和平期。至徽宗亲政，一方面改元崇宁，重用变法派诸人，变革朝政，已有重启边事之兆，如蔡京入相，贬章惇为武昌军节度副使，并以曾布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，诏枢密院具曾任管军及堪充管军人姓名以闻^⑨等等。另

① 《宋史》，中华书局1977年，第306页。

② 同上，第13639页。

③ 转引马全汉《打拉池古城堡历史沿革考述》。

<http://hi.baidu.com/maquanhan/blog/item/2bd0e413ee43220a5baf5333.html>

④ 李昭辉《打拉池：古城新镇的几重解读》。<http://www.tongzhuo168.com/Article/ShowInfo.asp?ID=231>

⑤ 同上。

⑥ 《琬琰集》卷5《韩仪公丞相忠彦行状》。

⑦ 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520，第18页。

⑧ 吕卓民《宋夏陕北争战与北宋筑城》，西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，第177页。

⑨ 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520，第21页下；《宋会要辑稿》，第6907页。

一方面，其时“对外形势”有了变化，青唐羌内乱，为宋新的开边活动提供了新的契机。

前述宋哲宗时积极筑堡开边，深入西夏境内，从而使得会州打绳川成为据宋泾原路与熙河路沟通交汇的战略要地。故元符元年(1098)九月，宋枢密院即筹划在熙河路会州打绳川等地“各进筑堡城寨，以期连通两路”。^①次年六月，熙河兰会路经略使孙路奏报称“近据苗履踏逐到古会州、巴宁会中间地形宽广，北控黄河，可以置州。已依朝旨计置合用楼橹材植等赴新城，欲候今秋先筑会州，毕工即移兵了当打绳川东、北楞摩之间两寨。”提出先筑会州，再筑打绳川的施行步骤。^②八月，诏“以打绳川系熙河路合进筑处，令熙河管认地分进筑。”^③“诏熙河速相度筑打绳川。”^④但其时会州新筑，尚未稳固，建置不全，几次兴废，主事者多着眼于城周诸寨的修筑，且熙河兰会路经略司指挥王贍等人领军进逼青唐，无暇顾及打绳川。九月，熙河兰会路经略司称“打绳川实系泾原、熙河两路要害之地，合行进筑”。宋廷下诏“候青唐事宜就绪，抽本路兵马应副进筑。”^⑤该年青唐内附，而其主事者熙河兰会路都监兼本路钤辖王贍又与孙路、王愍等内斗，筑城之事一拖再拖。后孙路被贬，胡宗回接任熙河兰会路经略使，认为等青唐事了，要“先将河北边冲要城壁修备，候明年相度河南，渐次修缮。”^⑥打绳川筑城之事就此搁置。因青唐叛服不定，宋终于弃守青唐，王贍归湟州。韩忠彦等人又建议息边事，罢筑城。^⑦建中靖国元年(1101年)，任伯雨又上书言驻守湟、鄯二州及陕西五路进筑堡寨之弊。其他诸人也有议并弃二州者。^⑧宋诏访姚雄言利弊，姚雄认为可以弃守。三月十六日，遂赐二州与青唐赵怀德，徙雄知熙州。^⑨姚雄以雷秀为东路统制，将湟州兵马由京玉关以归；以蕃兵总领刘玠为西路统制，将兵护湟州居民商旅由安乡关以归。^⑩这是宋议筑打绳川之背景与始末。

下句“熙河帅姚雄驻兵会州，应副钱粮运使吴安宪，统制官熙河郭祖德、刘戒，泾原乔松，秦凤刘德，西筑水泉、正川二堡通古会州。三月初，皆毕功。”言姚雄领筑水泉、正川二堡事。其中“应副钱粮运使吴安宪”句，《嘉靖固原州志》所录少“副”字，至语义不通，今据《重修靖远卫志》改。熙河路，其时全称熙河兰会路。《宋史·神宗本纪》称“置熙河路在五年十月”。《宋史·地理志三》“陕西路”条载，“庆历元年，分陕西沿边为秦凤、泾原、环庆、鄜延四路。熙宁五年，以熙、河、洮岷州、通远军为一路，置马步军都总管、经略安抚使。又以熙、河等五州军为一路，通旧鄜延等五路，共三十四州军，后分永兴、保安军、河中、陕府、商、解、同、华、耀、虢、鄜、延、丹、坊、环、庆、邠宁州为永兴军等路，转运使于永兴军、提点刑狱于河中府置司；凤翔府、秦、阶、陇、凤、成、泾、原、渭、熙、河、洮、岷、州、镇戎、德顺、通远军为秦凤等路，转运使于秦州、提点刑狱于凤翔府置司；仍以永兴、鄜延、环庆、秦凤、泾原、熙河分六路，各置经略、安抚司。”则在熙宁五年始分陕西路沿边熙、河等五州军为熙河路。因所辖有兰州、岷州，故又称熙河兰岷路。直到“元丰五年，熙河路加‘兰会’二字，时未得会州。元符二年，始建筑，割安西城以北六砦隶州。”《宋史·地理志三》“会州条”才开始称熙河兰会路。

“熙河帅”为宋对熙河路统军长官的称呼。一般而言，宋代经略使、安抚使均可称该路之“帅”。如熙河兰岷路经略使、宝文阁待制、知熙州孙路改河南府，以宝文阁待制、知庆州胡宗回知熙州。《曾布日录》记其事则称“孙路知西京，胡宗回帅熙州。”^⑪孙路、胡宗回在《宋史》中均被称为熙河帅，

① 同上，卷502，第13页下。

② 同上，卷511，第9页下。

③ 同上，卷514，第8页上。

④ 同上，卷514，第17页下。

⑤ 同上，卷515，第12页上。

⑥ 同上，卷516，第1页上。

⑦ 《宋史》卷312《韩忠彦传》，第358页；《琬琰集》卷5《韩仪公丞相忠彦行状》，第1143页。

⑧ 赵汝愚《宋朝名臣奏议》，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点校整理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，第1669、2386、4872页。

⑨ 《宋史》，第1106页。

⑩ 徐松《宋会要辑稿》，中华书局1957年，第6907页。

⑪ 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，第8页下；徐松《宋会要辑稿》，中华书局1957年，第3775页；《宋大诏令集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，第789页。

两人都有熙河路经略使的头衔。有意思的是此时姚雄虽然因入援青唐王贻，“四战，获二千余级，而亡失止三十八人”的战绩由秦州刺史、熙河兰会路兵马都监兼知河州、管洮西沿边安抚司公事，兼第三将升本路钤辖依前知河州兼洮西沿边安抚使，后又知熙州，特除正防御使臣等，仍非本路经略使或经略使一级的官员，其安抚使头衔也是“兼洮西沿边安抚使”。^①而《宋史》姚雄本传称“熙河十八年间更十六帅，唯雄三至，凡六年。”也将其称为熙河帅。则可推知不仅熙河路经略使、安抚使可称“熙河帅”，知熙州，任本路钤辖者似亦可称“熙河帅”。尤其是如上文提及的姚雄本身已至安抚使之位，而实任本路钤辖，被称“帅”自是情理中事。

姚雄，字毅夫，五原人，《宋史》有传，但稍嫌简略。雄出身军人世家。父姚兕、叔父姚麟、弟姚古均以边功著称。他十八岁即随父征伐。曾为泾原、秦凤将，驻甘谷城，知通远镇戎军、岷州，官累左骠骑使。^②元符二年（1099年）“（八月）丁亥，诏‘修复会州，就差四方馆使、秦州刺史、知镇戎军姚雄知会州兼管勾沿边安抚使，充熙河兰会路兵马都监’”。^③绍圣中两次平夏城之战，姚雄均帅熙河军团参战以军功先后擢东上阁门使、秦州刺史，徙知会州，领熙河钤辖。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熙河兰会路兵马都监、兼知河州姚雄统军援青唐王贻部，与王贻屡败叛羌。^④建中靖国初，宋议弃湟州，姚雄以为可弃，遂以赐赵怀德，徙姚雄知熙州，进华州观察使。^⑤三年宋弃青唐，自湟州撤军。姚雄又“四战皆捷”，“获（首）二千余级，而亡失止三十八人。”“遂筑安乡关，夹河立堡，以护浮梁，通湟水漕运，商旅负贩入湟者，始络绎于道。”特除正防御使臣，升本路钤辖依前知河州兼洮西沿边安抚使及加复州防御使。^⑥随后姚雄复知熙州。^⑦而碑文所记，正是姚雄自湟州回撤熙河后这一段时间的所作所为。崇宁元年（1102）五月，宋徽宗削元祐诸臣之秩，以翰林学士承旨蔡京为尚书左丞。^⑧蔡京用王厚复河湟，追究议弃青唐罪责，姚雄因此丢官。^⑨

另外还可注意者，为其时姚雄所辖部队为“统制官熙河郭祖德、刘戒，泾原乔松，秦凤刘德”。自宋改太祖更戍之法为将兵法，熙河帅领熙河兵自无疑义，但为何还有泾原、秦凤兵马？这是因为熙河与西夏、青唐接壤，而熙河路一面派王贻等部入青唐，谋夺鄯、湟，一面又因筑会州及其周边堡寨而与西夏交恶，自然倍感兵力不足。因此，宋频频抽调与熙河相邻的泾原、秦凤两路兵马入戍熙河。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所载，“遣秦凤戍兵十指挥应副熙河新边戍守”。^⑩“遣慕化、李忠杰将部落子及尽发秦凤战士赴熙河，讨定新边”。^⑪“又诏泾原、环庆各选步兵三千、骑兵两千赴熙河路”。^⑫《宋史》卷196《兵志》“屯戍之制”条也有：“（元符）三年八月，诏遣虎翼军六千戍熙河路，令代蕃兵及弓箭手还家休息。”可知当时驻守熙河的部队除本路厢兵、驻守禁军及部落兵、蕃汉弓箭手以外，还有自泾原、秦凤抽调的“友军”。实际上，据《长编》卷517记载，苗履、姚雄入援青唐时所帅部队也非本路军马，而是秦凤兵。^⑬所以，此时姚雄帅熙河、泾原、秦凤三路兵马，恰恰反映了此时熙河路所面临的复杂形势和其边防驻军的真实状况。

至于其所西筑水泉、正川二堡，《宋史·地理志三》“会州”条载，“水泉堡，系怀戎堡管下，距本堡二十里，不系守御处”。“正川堡。系德威城管下，啰迷谷口新移正川堡距本处二十五里，不系守御处”。二堡均无驻兵。

① 徐松《宋会要辑稿》，第6907、7002页；《宋大诏令集》，第343页。

② 《宋史》，第11060页。

③ 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514，页11上；《皇宋十朝纲要》卷14，第6页上。

④ 徐松《宋会要辑稿》，第6907页。

⑤ 同上，第6907、7002页。

⑥ 《宋史》，第11060页；徐松《宋会要辑稿》，第6907、7002页；《宋大诏令集》，第343页。

⑦ 《宋史》，第11060页；徐松《宋会要辑稿》，第6907页。

⑧ 《宋史》，第363-364页。

⑨ 同上，第11060页。

⑩ 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516第7页上。

⑪ 同上，卷517，第1页下。

⑫ 同上，卷517，第15页下。

⑬ 同上，卷517，第4页上。

第三句“行打绳川，赐名怀戎堡，隶会州熙河第八将。”说明怀戎堡筑堡时间约为崇宁元年（1102年）三月。“隶会州熙河第八将”则说明其时熙河路第八将驻会州。但是，根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记载，元符二年（1099年）熙河兰会路经略使胡宗回言：“今相度鄯州合置知州、通判、签判、司理、司户参军兼录事、司法各一员，兵马监押、巡检各二员，置保安一指挥厢军，湟州、宁塞城共置一将，正将於湟州、副将於宁塞城驻扎，马军两指挥、步军三指挥，湟州北城一指挥厢军，本城一指挥。鄯州置一将，充熙河兰会路第八将；湟州、宁塞城共置一将，充第九将，所有将副，令经略司选官闻奏。”^①则宋始置熙河第八将应为元符二年（1099年），原驻地应为鄯州。碑文称“赐名怀戎堡，隶会州熙河第八将”，即熙河第八将此时驻于会州。说明，随着宋弃青唐，王赡等回撤，并未取消熙河路第八将的设置，而是自驻守鄯州移到会州驻守。

怀戎堡。《宋史·地理志三》“会州”条载，“怀戎堡，崇宁二年筑，属秦凤路。东至泾原路分界定戎砦地分二十二里半，西至本堡管下水泉堡二十里，由香谷至会州共六十里，南至会川城分界三十五里，北至柔狼山界墩四十里，系与夏国西寿监军地对境，经由枯柴谷至柔狼山，有险隘去处。”则言怀戎堡，属秦凤路管辖。结合碑文下文记载，我们似可推知，怀戎堡的隶属关系，可能为熙河路第八将—泾原路第十五将—熙河第八将—秦凤路，最终隶属秦凤路。

碑文第二段讲怀戎堡的地理位置与环境、物产。其中“西北去马练城八十里”，少“西”字，今据《重修靖远卫志》、《宋史·地理志》改。就目前所见，《打刺赤碑记》是记载西夏西寿监军司确切地望的最早资料。学者一般多利用碑文此段中“东北去西寿监军一百五十里”之记载，来考证、确定西夏西寿监军司的位置，认为“对于西夏的西寿保泰军，连《西夏纪事本末》卷首的《西夏地形图》也未标出位置来。历来史籍也未叙述到底在何处。而《打刺赤碑记》，是考证其详址的最好依据。”^②另外，笔者前引《宋史·地理志三》“会州”条载怀戎堡地理方位时也有“西至本堡管下水泉堡二十里，由香谷至会州共六十里，南至会川城分界三十五里，北至柔狼山界墩四十里，系与夏国西寿监军地对境”的记载。此二者可为确定西夏西寿监军司的确切地点提供有力证据。

碑文第三段讲大观三年（1109年），怀戎堡废与安泰重修事，其中《嘉靖固原州志》“己丑春，废寨”，“与夏人分画界”，“择将深沉镇静、果敢有勇者”三句，《重修靖远卫志》分作“己丑春，废寨”，“寨”为“寨”字；“与夏人分画地界”，多“地”字；“择将深沉镇静、果敢有为者”，“勇”为“为”字。

碑文最后讲立碑缘由和落款。《嘉靖固原州志》仅存立碑缘由，在碑名后有“巡检柳世雄立石”，无落款。《重修靖远卫志》则有“政和元年辛卯岁六月壬辰八日巳亥，巡检柳世雄、冯进，监押杜谓、唐昱，部队将假遇、赵普、崔恩，供备库副使第八将兼堡事武骑尉张安泰书。”但无“巡检柳世雄立石”字样。《重修靖远卫志》落款按照官职，从低到高排列，以其时最高长官张安泰收尾，符合宋代碑铭的一般格式，当为原碑落款，故从之。

结合上段，我们可以推知，怀戎堡的建制如下：堡事早期设有专门官员，后由熙河第八将兼领，设有“将副”；设有巡检司衙门，有管捕盗事务的巡检和驻军官员如监押、队将等军职。按《长编》元符二年（1099年）载“（八月）丁亥，诏‘修复会州，就差四方馆使、秦州刺史、知镇戎军姚雄知会州兼管勾沿边安抚使，充熙河兰会路兵马都监……其会州合置通判、职官、曹官、都监、监押、巡检等并依西安州例施行。除会州通判堂外，其余员阙令经略司一面选差官权管勾’”。^③说明会州设有通判、职官、曹官、都监、监押、巡检等官员，由本路经略司“选差官权管勾”。怀戎堡隶属会州，其官员当亦为本路经略司派遣。^④在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，据陈瑞青先生指出，该碑也是较早记载有巡检的宝贵资料。碑文落款出现的巡检，是宋沿袭唐、五代之制而广泛设置，是其社会治安网络

① 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516，第9页下。

② 鲁人勇、吴忠礼、徐庄《宁夏历史地理考》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，第155页。

③ 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514，第11页上。

④ 徐松《宋会要辑稿》，第4692页。

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这里的巡检，当是其在边疆所设，除一般防盗职能外，还当兼有国防之职责。宋代巡检制度不仅被宋人称之为“万世之良法”，而且影响后世，元明清均有承袭。^①

综上所述，《打刺赤碑记》所包含的信息，不仅真实反应了 1098 年至 1102 年熙河地区的复杂关系及北宋沿边政策的变化与边防形势，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宋、夏、青唐之间的复杂多变的关系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，同时也为我们了解宋代边防的实际情况乃至军队建制、边防官职等提供了足够详细的信息。可以说，《打刺赤碑记》所包含的信息为我们细致地勾勒出这一时期宋与西夏、青唐三方在熙河路角逐的轮廓图。另外《打刺赤碑记》所记载怀戎堡周边地理环境，“林木森茂，峰峦耸秀，山间泉流数派……堡之西南百余步，有泉眼涌出，泓澄甘冽，止而为湖，不徒有赏玩之景，民田灌溉实赖其利。”与今日现实相对照，除了解怀戎堡古今自然环境的变迁外，也深切感受到保护自然环境的必要与急迫。

（作者通讯地址：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，银川 750021；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，银川 750021）

^① 胡旭宁《宋代巡检制度研究》，《河南大学》2006 年硕士论文。